

**【锐眼看市】**

**基础设施托举起来的
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和
机场等实务形态,更能擎
起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
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
层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
易、服务贸易、采购贸易以
及口岸贸易和跨境电商借
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
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
善的诸多红利。**

经济融合：“一带一路”的精彩大手笔

张锐

从10年前发起倡议,到如今纵深推进,“一带一路”走过了春华秋实的阶段性非凡里程。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秉承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务实使命,不仅在每一个领域潜心精耕细作,而且批量运作出了气势磅礴与恢弘壮观的无数大手笔,尤其是作为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经济融合核心引擎,“一带一路”彰显出的超级能量可谓无与伦比,实践中所沉淀出的累累硕果更显得特别厚重与饱满。

开放与包容:经济融合的 宽大高地

“一带一路”不仅表达出了十分明确的对外开放诉求,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公共产品,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完全不同,“一带一路”则是将开放与连接更为紧密地耦合起来,在强调“开放”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连接”的价值。因此,“一带一路”的开放绝对不同于历史上马歇尔主义撇开“钱袋子”面对西欧国家的简单输血,更不同于战后美国拉开“钱匣子”面向日本的直接撒钱。

首先,“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与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最为优先的投资建设领域。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5.8%,形成了公路与铁路网、连线港口以及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

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在内的批量基础设施建设成果。

其次,“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常健全的工业体系无疑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产业对接以及分工协作方面做出优化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各国形成产业关联与产能协作后无疑可以带动相应国家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培植出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第三,“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及市场共生的多元立体链接。通过产业转移过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以及各种技术合作,实现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彼此借鉴,以及在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最终混合与嫁接呈现新的技术业态;同时共建国家的产业对接与衔接可以完善和拓展产业价值链,并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价值链升级;此外,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便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嵌入与融合,放大市场的规模效应。

基础设施的连接、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衔接以及多元立体的链接,实现了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快速畅通以及高效配置,推进了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进程,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方的中国赢得了更多国家的信任投票。英国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超过了62%,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年均进

出口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至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8%。

合作与共享:经济融合 的强大驱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经济体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仅靠一己之力都难以成功实现预期目标。对此,“一带一路”倡导和平合作、主张利益共享,推动全方位融通,目的是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资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并将这些要素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同时利用与开发带路各国的资源与要素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完成集成创新,推动优势资源的聚合与裂变,激发与释放出更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增长。

首先,“一带一路”并没有封闭性线性突进,而是积极寻求与各国区域发展规划的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属于宏大经济地理空间发展战略,发挥好作为公共产品的牵引与导向作用,必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单元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平台,对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战略”、印度尼西亚“中等强国战略”和“21世纪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以及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

其次,“一带一路”并没有孤立性盲目推进,而是主动谋求双边力量的策应与整合。数据显示,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按全球近200个国家计算,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了世界上超过3/4的国家积极支持;如果按中国建交国182个国家计算,超过80%的建交国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协奏。

第三,“一带一路”并没有偏执性自我发力,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寻求作为建设核心部位的资金融通与聚合。除了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外,中国还与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制开展建设磋商,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推动了丝路基金的组建与运营;不仅如此,中国还与许多国家及不同经济体的银行联合体就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业务展开务实合作,同时10年间与“一带一路”上的17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

共赢与普惠:经济融合 的巨大红利

任何一种开放性和国际性公共产品,只有展示出十分明显的共赢与普惠属性方可形成强大的共赢。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而言,其不仅仅是项目参与者与力量贡献者,更是利益分享者与成功分享者。

在“一带一路”所关联到的项目品类中,最能直观看到的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红利。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10%,其出口将增加20%。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更揭示了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控制第三国效应等变量后,共建国家铁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

10%,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2%、5.5%和1.1%的水平。

理论推测也仅仅只是一种主观认知,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基础设施,中欧班列加速度所跑出的成果更是可圈可点。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城市,10年来累计开行7.7万列,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超3400亿美元。除中欧班列外,还有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以及蒙内铁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所外溢出的超级红利,其中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承载的货物流向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厄尼雅万高铁(雅加达至万隆)开通后,两地间最快通行时间由原来的3.5小时压缩至40分钟,中老铁路(中国边境到万象)落成后两国国运只需4个小时,多山缺路的老挝由此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非洲蒙内铁路(蒙巴萨至内罗毕)开通后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托举起来的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实务形态,更能擎起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层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采购贸易以及口岸贸易和跨境电商借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善的诸多红利。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42.1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帮助76万人脱离极端贫困,帮助32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环宇杂谈】**

**新形势下的城中村改造
目的是要将城市标准的
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覆
盖到城中村,让住在里
面的人享受到均等化的
城市公共服务。**

城中村改造 肩负重任

李宇嘉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5%,跌幅较1~8月扩大了0.4个百分点,跌幅连续5个月扩大。1~9月份开发投资下降9.1%,跌幅扩大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已连续7个月跌幅扩大。房企到位资金同比减少13.5%,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降幅连续5个月扩大。

老生常谈的是收入、信心、预期,但这只是表象。无论从供给端死不悔改的同质化竞争(看谁价格低、看谁赠送多),还是从需求端潜力需求很大、现实需求很少(想买的人买不起,有钱的人又不缺房,有需求的买不到合适的产品)来看,房地产的模式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变化了。近期国家在大力宣传三种模式的城中村改造,就是这种新模式的有效试水。

7月份,国家发布了城中村改造的文件,并进行了总动员。有人认为,城中村改造是棚改2.0。其实不然,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断然不会再来一场棚改,让供求关系更加积重难返。新形势下的城中村改造,目的是要将城市标准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城中村,让住在里面的人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

最终目的是让城中村居民彻底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笔者调研发现,租住在城中村的,除了新市民和年轻人,很多是已婚或拖家带口的外来人群,且基于亲缘、乡缘聚集在一个村里,长期租住于此,赚了钱或年老时再返回老家。对于日后购置商品房并扎根这里,多数人摇头、不抱希望,“由租转买”的比例不足3%。一来没打算,二来无法融入城市,三来收入不支撑。

由此,我国大城市买房和租房

是“两张皮”,大部分人一辈子租房,特别是在城中村租房的人群。城中村是城市里的农村,是城市化不彻底的产物。尽管城中村的生产生活已融入或半融入城市,但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模式还是按照村集体来供应,村民及居住在此的外来人口、新市民也不认同自己已融入城市,仍是外来人口或漂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的另类。

城中村改造就是要破解这个难题,两轨合一轨。按照住建部提出的三种改造模式,拆除新建的按照城市的标准规划、建设、管理;整治提升的要按照文明城市的标准去进行实施管理,守住安全的底线;拆整结合的要将腾出的空间用于必要的公共服务补短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结合起来,保固低成本、低租金、容纳性强的底色。

国家指导意见及各地文件提出

了三种保障房的渠道,一是城中村改造地块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模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是复建安置区除了满足村民自住外富余的出租房,相对集中建设,并长期租赁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三是对存量留用的出租屋开展品质提升,吸引社会力量做规模化长租房经营。

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分别为1873万和1766万,广州大约1/3居住在城中村,深圳有1000万人住在城中村。放眼珠三角,7800万常住人口住房自有率仅50%左右,3900万左右的人群租房,一半左右住在城中村。除珠三角,过去20年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摊大饼扩张,超大特大城市也诞生了大量城中村,多的有300个左右,少的数十或上百,居住人口百万计。

楼市有效范围在缩窄,超大大特

大城市是地产未来的基本盘。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新市民、年轻人能在城中村改造后融入城市,不仅能租住成本低、体验好、品质高的保障性住房、长租房,也能分享城市化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还能在保留或就地转型的村内产业(临街商业零售、餐饮服务)、村级工业园就业,或在周边城市片区就业,这才是真正的扎根城市。

由此,美好生活的需求就会不断释放,“由租转买”、“租购并举”的住房需求就会实现,地产“需求断层”的问题渐次破解,这是我国内需的基础,也是商品房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当然,城中村的短板和欠账很大,需要投入资金,也需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国家上政策给了很多优惠,接下来就需要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创新,勇于担当和突破。

(作者系房地产资深人士)

**【念念有余】**

**现在全民几乎都识字,
都会拍照摄影,历史
事件基本上都会被记载
下来。**

从佣国的发现看历史偶然性

余胜良

我在深圳南山博物馆《晋国六百年》展览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叫“佣”的国家,如果不是佣国国君的墓地被发掘,如果青铜器上没有记载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留任何踪迹。

佣这个国家尽管是少数民族,但是被封的位置很好,位于山西省南部的绛县,位于晋水一带,距周朝核心城市洛阳,以及周的都城镐京都不远。有人推测,这个族群和西周关系好,跟着武王伐纣胜利后获封。但是史书从来没有记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好像没出现过一样。

青铜器就有这样的优点,它们颜色可能有变化,当时样子基本上不会变,能保存很多年,这应该是当

时统治者赋予青铜器神性的原因吧,后期记载文字的龟背、牛骨、竹简,都没有这么强韧。但是青铜器也有缺点,承载字数有限,所以即使筑了一个符号,一个文字,也能与众不同,那些有几十个字的,就会让青铜器身价倍增,可以当做历史证据。

在佣国墓葬青铜器中发现了刻有“佣伯”和“佣伯乍毕姬宝旅鼎(盃、簋)”铭文,佣伯和他的妻子毕姬的墓葬都很豪华,后者的墓葬在某些规格上更高,通过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学者推测毕姬的“姬”是周天子姓姬,毕姬应该是周天子之女或至少是王族之女,下嫁佣伯,血统比佣伯高贵,毕姬墓中出土有周王室宰相送给她的青铜鼎,说明她身份不凡。

佣国墓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风

格和当时的主流文化相同。佣国所在的山西板块,有不少诸侯国,晋国自武公开始,大兴灭国之风,先后吞掉了霍、魏、虞、冀、黎等17个国家,都有据可查,但是佣国始终没有记载。幸亏佣国属于当时的主流文明体系,文字很容易破解,才能在近些年考古发掘后重见天日。

一个存在历史不长,青铜器铸造技术纯熟,和王族有通婚,位置也不算偏远的侯国,偏偏没有被历史记载,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因为历史资料稀少,无法得知这个创立者是谁,最终是如何消失的,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人们了解这个国家,只能通过墓葬的规格、出土器物和文化倒推。

如果这个佣国的侯国发生过希腊史诗那样波澜壮阔的故事,由于

缺少记录,也跟没发生过区别不大,我们后人都无缘了解了。我们后人了解的,那些被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些历史,殷墟出土的文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是内容太少,传世不易,比如好在甲骨文里提了2000多次,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没有提及。这说明历史记载断代了,和商有关的记载可能被刻意隐藏了,只剩下一些神话传说。我们熟知的武王伐纣,主要借助《封神榜》这样的故事传播下来。

历史传播大多要借助文学作品,比如国人对三国历史了解得相对比较多,三国时期故事精彩,谋士和武将能人辈出,《三国演义》功不可没,其他时代可能也有类似的故事人物,但是缺少传神作品。

我们会发现,早期历史大多是

以神话故事的方式流传,主要是文字记载比较少,文字或者还没创造出来,掌握文字的人都比较少,要靠口碑相传,精彩的故事才能传播开来,传播留世的只剩下神话。

因为文字记载少,难免没有被记载,或者虽然记载下来,但因为种种原因被篡改、销毁的情况,史官才能记载历史,官方高度垄断话语权。朝代更迭,还会审查前朝历史记载。还有一些记载比较少,成为孤本,出现意外也容易消失。

但是越往后,随着读书人越来越多,事件亲历者有能力将事情记载成为文字,一些知名人物、事件越来越容易传播下去。现在全民几乎都识字,都会拍照摄影,历史事件基本上都会被记载下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